

一个意大利记者眼中的 北京



(1976—2008)

AN EYE-WITNESS OF AN ITALIAN JOURNALIST IN
BEIJING

[意]阿德里亚诺·马达罗 著/摄 陆辛 译

人民出版社

一个意大利记者眼中的 北京

(1976—2008)

AN EYE-WITNESS OF AN ITALIAN JOURNALIST IN
BEIJING

[意]阿德里亚诺·马达罗 著/摄 陆辛 译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林 敏

装帧设计：曹 春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一个意大利记者眼中的北京(1976-2008)/(意)阿德里亚诺·马达罗(Adriano Madao)著 陆辛 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1

ISBN 978-7-01-007427-6

I.一... II.①马...②陆... III.改革开放-概况-北京市-1976~2008
IV.D61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4638 号

书 名 一个意大利记者眼中的北京(1976-2008)

YIGE YIDALI JIZHE YAN ZHONG DE BEIJING

著 译 者 (意)阿德里亚诺·马达罗(Adriano Madao)著 陆辛 译

出版发行 人 民 出 版 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6)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总 经 销 人民出版社发行部

邮购电话 (010)65132886 65250042 65289539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 数 2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01-007427-6/

定 价 148.00 元

我眼中的马达罗（代序）

1986年初我在北京国际饭店工作，任餐饮部副经理，主管西餐和酒吧业务。一天总经理把我找去，说意大利著名的“图拉”餐馆集团通过一位热心的意大利朋友找到中国驻米兰领馆，愿意和北京国际饭店合资经营意大利餐厅，定于一个月后来华洽谈此事，特别提到这位意大利朋友，叫Màdaro，是一位意大利记者，也是中国驻意大利使领馆的老朋友，曾多次来华，写了不少正面宣传中国的书籍。一个月后，在北京饭店我见到了这位意大利朋友。他的个头不是很高，但是他那风度翩翩的举止和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最早的接触是从起名字开始的，他让我给他起个贴切的中国名字，这对我这个学拉丁语言的人来说不难，稍加思考，一个和意大利语发音接近又很上口的中国名字出现了，马达罗，他非常满意这个名字，因为按照中国属性，他是属马的，后来我就干脆叫他老马了。没想到这个老马，竟成了我的好朋友，国内国外，风风雨雨，一下子20多年过去了，从1976年老马第一次来中国到2008年的32年里，老马前后来中国155次，竟有140次是由我陪伴他的，平均每隔两个月就能见面。如果我忙或者在国外，他是不来中国的。

老马是个记者，他非常热爱中国的历史文化，他可以准确地说出中国各个朝代的起始时间和发生的重大事件，甚至皇帝的名字、年号、庙号，以及生卒年月都记得清清楚楚。而让我最为感动的是他对老北京历史文化的喜爱和崇拜，达到了如痴如醉、登峰造极的程度，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把我

们捆绑在了一起。开始，我并不是个老北京迷，在中学和大学，我的历史成绩是最差的，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脑子里对过去是一片空白，而真正改变我，把我“拖下水”的是老马。理由很简单，面对着一位来自数千公里以外的意大利人，向你如数家珍地讲述着辉煌悠久的中华文明史，而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却显得如此的无知和渺小，自然很惭愧啊！后来我们就有了本书老马文字中提到的情节。那时，我们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骑自行车，乘公共汽车和火车。无论刮风下雨，无论严寒酷暑，我们走遍了北京，走遍了全国，拍摄了数万张照片，收集了数千册有关风景、古建筑以及文物的书籍和画册。

那时的中国还没有完全开放，一个中国人带一个欧洲老外，背个相机、摄像机大街小巷地转悠和拍摄，可想而知有多困难。友善，好奇，拒绝，回避，警惕，监视，我们在这些表情和目光注视下，记录了当时最真实的镜头。一次在外地拍摄录像，我和老马被请进当地派出所，被警察询问了4个多钟头才放出来，原因是当地群众举报老马拍摄了一个小孩向他要钱的镜头，而老马又是意大利人，他们把他当作安东尼奥尼了*。这个真实的故事，今天听起来很可笑，可是20年前、30年前在中国是经常发生的。

*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1912—2007），意大利电影大师，一生创作了25部电影和众多剧本。1972年他来到中国，拍摄了纪录片《中国》，记录了1972年中国的城市和乡村。

老马不是专业摄影师，他的作品谈不上有多高的艺术水平。他是个记者，作家，也是一个非常热爱中国，特别是北京的外国人。他的镜头始终对准普普通通的百姓，作品反映的是真实的百姓生活。1990年后，老马拍的作品明显减少，用他的话讲，找不到他所喜欢的感觉了，到处是高楼大厦，现代化了。

不知为什么，老马对北京有如此深厚的感情：老北京的消失，他痛心；新北京的建立，他为之骄傲。“非典”来了，他难过，特地从意大利赶到中国参加抗击“非典”的斗争。真如他所说，北京是他的第二故乡。每次乘飞机从国外或者外地回到北京，当他看到机场高速收费口的古牌楼建筑时，就激动不已，我坐在他旁边，足能体会他那种感受。

以前，老马的作品多是在意大利出版。2003年起，经已故的国内著名的意大利文学翻译家吕同六先生的介绍，老马结识了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林敏，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关于北京的中文译本：《1900年的北京》。这本书是老马根据当年意大利驻华公使朱塞佩·萨尔瓦戈·拉吉侯爵留下的外交皮箱中的珍贵资料而编写的，书中采用大量的历史照片形象、真实地介绍了100多年前北京发生的这场历史事件，许多资料是从未发表过的。正因为如此，2008年国家大剧院上演话剧《天朝1900》时，经老马授权，从该书珍贵的历史照片中选取了百幅珍品举办了“1900的北京”图片展，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本书是出版计划的第二本书，根

据林敏编辑的策划创意而编排，入选了新闻出版署“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百种图书”。本书在中国的出版采用中英文对照的方式；在意大利的出版，则采用的是意大利文和英文对照的方式。为了充分地表达作者老马的真实思想，我尽可能地根据意大利文原意，参照英文稿的翻译表达方式进行翻译和整理。我们在工作中得到了鲁岚峰、李玉成、陈伯祥等老师们的热心指导。明年计划出的第三本书：《1839年前的北京》（暂定），是根据老马收藏的有关那个时期的西洋版画和西方造访者的文章来描绘一个康乾盛世的北京，一个在西方人眼里神奇的北京，一个未遭受外国蹂躏的北京。

老马的中国之行在继续着，他对中国的热情和关注在继续着，他和人民出版社的合作也在继续着。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越来越扎根在他的心灵深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前生是一个中国人。

陆 辛*

二〇〇八年十月

* 陆辛，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曾在国旅做过导游，在北京国际饭店餐饮部当过经理。后在意大利留学。回国后，在意大利某服装集团任驻华首席代表。现在自己开设一家公司，专门从事有关中国和意大利两国文化交流和贸易的工作。

目 录

见证北京	1
An Eye-witness In Beijing	
改革的前夜 (1976 — 1978)	41
Before Reform	
崭露新机 (1978 — 1988)	97
Change	
新与旧的更迭 (1988 — 1998)	139
The New Displaces The Old	
与世界同步 (1998 — 2008)	161
In Step With The World	

见证北京

32年前，从意大利来北京是很困难的。我乘坐每周只有一班的班机从巴黎起飞，飞越了意大利、阿尔巴尼亚、伊朗、巴基斯坦和喜马拉雅山脉，最终从新疆进入中国境内。飞机抵达北京的时间比原计划晚了近一个小时。当时已经是晚上8点，天很黑了。在北京上空飞行和降落的过程中，窗外看不到任何灯光，我感觉自己来到了地球上一个很遥远的角落。当我走下舷梯步行穿过停机坪时，闻到的是机场上散发的航空汽油味，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候机楼里悬挂的一幅映照在昏暗灯光下的巨幅毛泽东画像。一片黑暗中，头顶上的星星显得格外明亮。如此美丽的星空，在以后我再来北京时是不多见的。

我乘坐的飞机是中国航空公司波音707型客机，飞行了近20个小时，只在卡拉奇做了短暂的停留。机舱里乘客秩序井然，他们个子都比较矮，身着蓝色或黑色制服，头戴同样颜色的帽子，女士们也穿着同样颜色的衣服，让我很难区分乘客的性别。

在北京机场的通道口，有两位年轻的机场服务小姐示意我到机场休息室休息，她们都身穿淡蓝色套装，脚上是黑色搭襻儿白塑料底的布鞋。休息室里散发着浓郁的茉莉花香水味，摆着几张考究的皮质大沙发，略显陈旧，但每个沙发背上都铺着白色棉钩织品，更显示出它的尊贵。这是间贵宾室，墙上挂着两幅巨大的装裱精致的中国书法作品。低矮的茶几上整齐地码放着一排带盖的茶杯，茶杯的中间有一只红色烤漆大暖水瓶和一只插着紫玫瑰的玻璃花瓶。这种细微的温馨，

不仅使人感觉不到革命年代的火药味，反而形象地预示我的此行会有好运气。两位小姐带着焦虑的神情回来，用蹩脚的英语向我解释说，因为时间太晚，今晚我不能进城了，没有出租车，也找不到任何可以送我进城的汽车，现在她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安排我到餐厅用晚餐。我们没有经过行李厅，直接到了贵宾室，所以我不知道我的行李在哪儿，也许压根儿就没有行李提取处。不过，此时我更关心的问题是今晚要在哪儿过夜。

这就是1976年4月29日的夜晚，在等待了多年并经过这漫长的飞行之后，我到达了一个既神秘又“封闭的”还笼罩着毛泽东革命神话的中国的心脏。气味，空气中散发出的文化大革命硝烟的气味，很像煤油和茉莉花的味道。说老实话，我还闻到一股大蒜味。这是从两位年轻小姐口中呼出的，因我盯着她们脖子后那两根摆来摆去的又黑又粗的辫子，一直跟在她们后面走。我终于成功地来到了这个闭关自守的国度，激动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顺其自然地接受了这几个小时在我身边发生的一切。

机场餐厅里有几张大圆桌，靠墙站着近10位女服务员。她们身穿白色工作服，站成一排，看见我进来，赶忙招呼我在一个大桌子旁坐下。桌上摆放着10套餐具。我好奇地环顾四周，没有见到别的什么人，只有我一人。我确实感到意外，这可是在大革命的年代里，却能有这么多的年轻姑娘为一个人服务，真不可想象，也许因为我是远道而来的客人？我一点儿不懂中文，那两位年轻小姐也没有帮我翻译。后来，服务员从厨房端来

了数量多得吓人的饭菜，我想她们以为会有10人用餐。这么丰盛的菜肴，我一个人怎能吃下？10个煎蛋，3盘肉菜，3盘海鲜，还有3盘蔬菜，另加一盆米饭，一堆像小山似的馒头外加10瓶啤酒。守候在我周围的10位天使般的服务员对我的胃口大失所望。我情不自禁地笑了，我应该把这些像宴会上的佳肴打包带走。

吃完晚饭，两位年轻小姐返回来带我去休息，我说时候尚早，是否可以去看机场。看得出来，她们对于我这么晚不睡觉的要求感到吃惊（已是晚9点），示意我跟她们走。在机场大厅，我看到许多上夜班的工人，看上去他们都是一些十几岁的年轻人，正在召开革命会议。大家盘腿坐在地上，手持著名的小红宝书，在激烈地讨论着什么。一座巨大的毛主席塑像在注视着整个大厅，塑像周围摆满了鲜花。我问这群年轻人为什么如此激动，在讨论着什么？他们中有一个人会讲英语，对我说，他们在讨论明天由谁去担任机场管理的负责人。那么，我是不是可以问问他们我的行李在哪儿？可转念一想，在中国首都机场，在他们召开无产阶级革命会议的时候，我提如此无足轻重的问题是否体现了我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思想？

候机楼通往市中心的林荫大道两旁种满了杨树。我来到马路右边一个兵营，一名站岗的士兵在照看我的行李。看来这里就是今晚我入住的酒店，在营房的门口，那两位年轻小姐向我鞠躬告别，在东方国家，鞠躬是一种礼节，不是卑屈。她们还说明天早上7点钟会有人叫早，并且陪我到

刚才吃晚饭的地方用早餐。什么时候进北京？答曰早饭之后会有人来带我进城。我提着行李刚刚走进一间不大的房间，身后房门立即被反锁上。房间里的两张铁床让我想起了老式医院，铁床上分别铺着粉色和蓝色的绣花被，在一张小木桌子上，摆着几只带盖的茶杯和一个装满开水的暖瓶。有两把扶手椅，扶手椅背上也铺着白色棉编织品，一个三条腿的木制挂衣架，这些就是这房间所有的家具。一扇小铁门的后面是间不大的厕所，有一个挂满了黄色水锈的马桶。窗户上像牢房一样装着铁条，只挂了一对绣着牡丹花的浅色窗帘。我马上意识到，明晨5点，阳光就会照到窗帘上，光线会刺醒我。现在是晚上10点，夜深人静，我得赶紧上床，很快便进入了梦乡。在中国度过的第一个晚上，我睡得很香，很多年来我都没有睡过这么好。如果不是第二天早上被窗外的广播喇叭播放的音乐吵醒，我还不知要睡到几点呢！我从床上爬起来，拉开洒满阳光的窗帘，看到了窗外穿着短裤和背心的军人，他们在整齐地出操，有节奏地高喊“一，二，三，一，二，三”，同时还不时地高呼“毛主席万岁！”这句在当时家喻户晓的口号。

一个个头比较矮的男子向我走来。他身穿蓝色制服，扣子一直扣到脖子下面，上衣的口袋里插着一只钢笔，轻声地对我说：“先生，您好！”他微笑着，露出一口不整齐的牙齿，头发精心修剪过，一双惺忪的睡眼有点儿肿。我忽然意识到，这就是国际旅行社委派给我的翻译。他直截了当地自我介绍。他说他是范同志，称呼他范就行了，

他的任务是尽责尽心地让我在北京的日子过得愉快；接着他又以严肃而和蔼的口吻告诉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在中国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我知道这是他的工作，不过我很



马达罗与范翻译的合影

喜欢他流露出的那种无奈的表情。如何让他和我一起，协助我深入地去探索这个国家呢？范接着告诉我要住的酒店叫新侨饭店，位于市中心，是苏联帮助建造的，酒店的条件非常舒适。后来我才知道，新侨饭店所在的这条街当年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曾经是外国使馆区，但范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这个话题。他只是告诉我，新侨饭店三楼有家北京独一无二的西餐厅，但只供应早餐。他表示，他会陆续解答我感兴趣的问题，并向我保证，他会陪着我，形影不离。接着他把我介绍给我们的司机，司机见到我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客气地问候我“你好”。“你好”这句话很快就进入到我的口语中。

从机场通往北京市区的马路比乡间的沥青路宽不了多少，路边种了两排白杨树，形成一条绿

色长廊，道路中间缓慢地行驶着马车、手推车和卡车，偶尔能见到几辆小轿车。每当通过喧闹的十字路口，四方抢行的车辆总让人感到似乎要发生交通事故，然而让人庆幸的是有惊无险，接着他们又在漫天飞舞的杨絮中继续缓慢地前行。路的两边是精心耕种的农田，远远望去，很像一个巨大的家庭菜园子，但是我见不到任何房屋和村庄，只看到一群群在黄土地上辛勤耕作的农民，微风掀起阵阵尘土，一面面红旗随风飘扬。到北京郊区时，路边出现了一些低矮的土坯房，房顶上覆盖着破旧的灰瓦，还可以看到一些墙面剥落的简易楼房，看得出是出自于非专业的泥瓦工之手。幸好四周绿色的大自然春意盎然，给我平添了几分好感，舒缓了远处大槐树树荫下的那些灰色矮平房带给我的压抑不安的心情。我不知不觉地置身于神秘的北京之中。我感觉到这里充满绿色，它压倒了其他景色。我们越往城里走，树木就越多地覆盖着房子，只能隐约看见灰色的围墙和带翘角小屋顶的油漆门。到处是人群，街上充满了熙熙攘攘的市民，所有的业务和活动都在街上进行，仿佛大街是他们的生活舞台，而那些低矮的房子只不过是日常生活演出中的幕布而已。绵延不断的自行车、手推车、马车、按喇叭的卡车、拥挤的公交车、背包的步行者，站在家门口等人或好奇消遣的平民百姓，我真难以想象这就是北京。我感到我是在穿过一座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它的农村面貌，布满灰尘的街道，简陋的建筑，身穿蓝色棉服的乱哄哄的人群，稀少的有特色或有纪念性的建筑，在安静连绵的槐树的轻

盈树冠覆盖下，景物时隐时现，这一切都使人感到这只不过是农村郊区，而并非一个首都，触摸不到中国首都跳动的脉搏。在人口众多的辽阔郊区，感觉不到制度管理上的威严和军队方面的傲慢。红色中国首都以没有武装、人性化和友善的方式向我问候，它那松懈平和的常态使我感到惊奇。我们驶进一条宽阔的林荫道后，我的朋友范马上告诉我，它便是通向天安门广场的神话般的、意为永久和平的长安街。长安街两旁依然是被槐树簇拥着的灰色低矮的房子，只是马路上车辆多了些。随后，我们拐入王府井大街。王府井大街是这座城市最重要的商业街，街头耸立着高大的北京饭店。在这条街上，我终于看到了一些有特色的建筑。这里，人群聚集在沿着两旁种了树的人行道上，商店里顾客盈门。我们经过一座天主教堂，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东堂，高大坚固的围墙紧紧包围着它。再往前走，可以见到美术馆顶上的黄色琉璃瓦。最后我们停在了一座只有三个侧面的俄式建筑前。这种难看的建筑外形，在20世纪50年代的东欧国家很流行。

这是一座接待海外华人的酒店，名叫“华侨大厦”。我之所以要在这里下车，为的是去签证办公室接受护照检查。怪哉！没有人问我昨天晚上住在哪儿。下车伊始，先闻到了一股炒米饭的味道。穿过大堂，范带我到了签证处，那里的人用茶招待我们。手续办得很快，范也不知和里面的官员说了些什么，惹得那官员哈哈大笑，最后官员用双手把护照递还给我。这种递名片的姿势，中国人依然保留到今天。一切都很顺利，现在我

已经取得了合法居留权，我要回我的酒店了。32年弹指一挥间，我一直想重新踏上当年我进入北京走过的第一个台阶，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家饭店已经修缮一新，变成了一个现代五星级的豪华酒店，也成了我在北京的常驻寓所。

新侨饭店*在崇文门旁边，离北京火车站不远，崇文门可惜在1969年被拆除了。我的房间朝南，正对着北京的外城。这家酒店之所以出名，是因为爱德华·斯诺曾在这里住过。斯诺是一位著名的美国记者，也是《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作者。在20世纪30年代，他冲破蒋介石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到了延安，谒见毛泽东主席和革命红军。60年代和70年代，他又受到毛泽东的邀请，重返中国，一直住在这里。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新侨饭店居住的都是对中国革命持友好态度国家的代表团。这里的服务员都接受过西方礼仪训练，知道“野蛮”的外国客人的古怪习惯，比如说外国人吃饭要用刀叉，衬衫和长裤要熨平，在电话挂不通时使用电报等等。一眨眼的工夫，我就到了房间。房间的钥匙是铜的，沉甸甸的，还挂了个很大的铝金牌，上面有“新侨饭店”四个红色大字。热情的范带我到了位于大堂角落的邮局，在那里我发了电报，电报内容是：我已到北京，ok，天气很好。到了晚上，我想给家人打个电话，却发现房间里没有电话机。后来才知道我必须到我的楼层服务台登记，由服务员与电话员

预约。楼层服务台在走廊尽头，那里有烧开水的锅炉和电话。我拿着护照，填了一张表，然后就回房间几乎等了一整夜，盼望着服务员跑来敲我的门。终于等来了服务员。他告诉我不知摇了多少次铃，总算拨通了经西伯利亚到意大利的电话。在那个年代，用手机打长途，简直是匪夷所思，甚至你想躺在舒适的软床上用房间的座机电话打长途，都十分困难。现在，我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尽快地深入到北京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去呢？看来一切都要指望单纯可爱的范了。后来，有一次他去意大利出差，受到我全家的热情款待。

我同意范的常规日程的安排，每天上午8点，当司机来时，我已经准备好出发。此外，我还想自己出去了解一些与众不同的，或者非官方开放的地方。当时的北京，吃过晚饭7点半后，街上几乎看不到行人，餐厅、电影院和剧场都基本上在晚8点关门，没有出租车，饭店房间里没有电视机。一人独自漫步在街头会有些凄凉，偶尔会见到几辆从农村来的马车，停在菜市场前卸菜。因此我常常晚上9点前睡觉，第二天拂晓就起床，有时5点都不到。起来后匆匆用冷水（这个时段不供应热水）洗个澡，用暖壶里的热水刮刮胡子，然后穿上衣服，挎上和我形影不离的莱卡相机出门。因为天刚蒙蒙亮，饭店的夜间值班员奇怪地瞧着我，然后很有礼貌地打招呼：“你好！”

北京帝王时期的老地图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现在的北京地理布局和那时比变化不大。除

* 马达罗首次来京（1976年）下榻新侨饭店，但必须先到达华侨大厦一层的签证办公室接受护照检查。

了鞑靼城墙*和大多数城门被拆掉外，北京城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多数古建筑保留了下来。虽然很多寺庙变成了学校、工厂和仓库，但它们地点没有变，依然留在我记忆中的位置上。那数不清的胡同，星罗密布的大街小巷，“鞑靼城”和“汉人城”**之间的网状连接，完美无缺。这就是北京百姓的生活基础。70年代中期我去北京的时候，每天早上，我都习惯独自在北京的心脏地区漫游，原来陌生的城市，如今却如此的亲近，带着毫无戒备的诚意呈现于面前。虽说是一个人独来独往，但并不感觉到孤独，因为处处都有友好的当地居民，他们好奇地看着我拍照摄影，并不认为我这个老外的相机镜头妨碍了他们的生活。我越接近北京人的日常生活，就越喜欢北京人独有的特点，比如北京人即使穷，也总是要显出他们高贵的气质，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喜欢别人称他“爷”。去上学的孩子们带着小马扎，因为当时学校还很穷，没有配备足够的椅子。老人们悠闲地抽着长长的烟袋锅，妇女们忙于家务活，街上小商贩叫卖着他们的商品，店铺的老板招呼我进他那不太宽敞的铺子逛逛，房子的主人们友好地向我比画着手势，让我跨过门槛，到他们的“四合院”里做客。“四合院”是一种四方形的庭院，是典型的老北京住宅。他们热情地招待我喝

* 指老北京内城，因老北京内城是在元代建的，马可·波罗曾到过这里，在他的“游记”中，他称这座城为“鞑靼城”，明朝在元代城墙的基础上改建成后来的明清两代的北京内城。可西方人还是喜欢称其为“鞑靼城”。

** 指北京外城，清代时，汉人必须住在外城，西方人习惯称其为“汉人城”。

茶，嗑葵瓜子。那时的北京不剩别的，就剩胡同，有的是胡同。我也成了“胡同串子”，漫无目标地串。北京人的友好热情，打动了我的心，几乎使我掉下了热泪。他们总是笑嘻嘻的，从不与人作对，就连当时尚存的最后一批红卫兵也不例外。他们自豪地把红袖章戴在胳膊上，虽不能行使任何的权力，但仍是体现着爱国主义的象征，对此我十分容易理解。在这个漫长的春天，毛泽东还健在，人们到处可以感受到他的身影。对他的个人崇拜达到了顶峰，在人们心中他已完全被神化。毛泽东慈祥的面容不仅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同时也出现在所有的公共建筑物上，他总是注视着他的臣民，让他们既安心又敬畏。

拼音是使用罗马字母和发音拼出汉字的音标，当时汉语拼音已经普及，所以街道和胡同的中文名称上都有相应的拼音，这很便于我学习汉字。首先我从方位词开始学起。在中国，方位词是五个而不是四个，因为除了东、南、西、北外还有中。中，是至关重要的，比如说天安门就是北京的中心。我在北京问路，从来不会问向左或向右，而是问向北或向南，或者问市中心在哪个方向，因为我的宾馆离天安门广场不远。今天依然如此，看着路标，我会准确地告知你所在的位置，是在南、北，还是在东、西。我的方法很简单，比方说我现在在安定门内南大街，如果要返回饭店，只要找到崇文门内北大街就可以了，因为我的酒店位于崇文门内北大街和东便门内西大街的交汇处。我经常做这种辨别方向的练习：观察太阳的位置，从北京平房灰色的屋顶上，辨别

出那个最高的金黄色琉璃瓦顶就是故宫，这样很容易找到回宾馆的路。而现在已经不可能了。那个年代的北京，能高过故宫太和殿的建筑寥寥无几，只要角度对，我经常可以透过绿色的树丛，看到故宫金黄色的瓦顶。我的记忆里，永远印着这样一幅壮丽的景观：夕阳西下，绿茵中的宫殿瓦顶闪闪发光，仿佛镀上了一层灿烂的金黄色，宛如一只巨大的盛满菠菜的大碗上面放着一个巨大的煎鸡蛋。

那时北京人的生活，像乡村一样简朴。在早上和下午上下班的高峰期间，大街上可以看到潮水般的自行车洪流，数不清的车铃发出丁零零有节奏的悦耳声。清晨，经常能看见老人们在公园里或在街边练操，打太极拳，另外一些人在舞剑，他们挥舞系着红丝带的木制宝剑；而年轻人则在庄严的进行曲中练功习武，犹如在和一個假想中的敌人搏斗。那时的出租车很少，而且不可以马路上停车载客。如果要用车的话，只能到北京几家屈指可数的宾馆去办理包车手续，一般是包一整天或数天。在那时，人们一般推荐外国人到宾馆就餐，原因之一是那里的菜肴更“国际化”，而所谓的“国际化菜肴”是指有更多的选择，可选粤菜或川菜，外国人比较喜欢这些口味，因为这些菜与北京的风味菜有很大的不同。在我看来，北京有一家不错的饭店，那是一家位于西单路口的伊斯兰风味餐厅，我常去那里，它离我经常光顾的书店很近。而我每次去，他们都热情相待，招呼我到二楼用餐，那里的餐桌铺着台布，而且可以喝到冰镇啤酒，这是对外国人的一个特例，当

时大部分中国人都不爱喝特别凉的饮料，哪怕是在盛夏酷暑，他们爱喝开水，有时还往开水里加些盐。

在故宫空旷的庭院里，游客们带着惊奇的目光注视一切，他们用农民般粗糙的大手摸一摸金漆柱子，敲一敲带有祥云大龙图案的大石雕。游人穿着棉衣，梦幻般地漫游在这块曾被脚穿丝锦鞋的皇帝们踩过的土地，如此的富丽堂皇让他们惊叹不已。也许他们在思考，眼前宫殿中的宝座，就是曾经被他们推翻的旧封建神权的象征，而今却让他们望而生畏，神色迷茫不安。显而易见，他们沐浴在这庄严神圣的气氛中，却听着舒缓悠扬的音乐。音乐声在巨大的天花板和地面之间回荡，并飘荡到宽大庭院的各个角落，最后消失在门外影壁上的那些张牙舞爪的巨龙旁。我注视着这些漫步在金碧辉煌宫殿群中的朴实农民，他们的神色是严肃、崇敬的。宫殿和农民，如此完美的一幕震撼着我，激起我极大的拍摄热情，我的镜头对准了选中的任一目标迅速地进行抓拍。可爱的范望着我，感到莫名其妙：为何故宫遥远的过去让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如此着迷？我给他解释，古代的工匠们建造了一座完美和谐的建筑群，在我看来，她是古代中华文明的经典杰作。他笑了笑，理解我为什么如此赞美中国的“过去”，而他还得批判“过去”，因为在那时候，消除过去的封建意识的影响是政治需要。随着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以及毛泽东主席身体的每况愈下，一切都停止了。我预感会发生重大事件，人们在担心会发生什么意外，然而却没发生。1976年春天，在“伟大舵

手”去世前的5个月里，北京被一种无疼痛感觉的麻木气氛所笼罩。

一次去长城的浏览使我加深了对郊区农村的了解。一条古时留下的老路蜿蜒在春意盎然的山脉中。我们穿过几个像鲁迅笔下描述的村庄。当时八达岭的游客稀少，小商贩更少，眼前一派雄伟而自然的风光。游客多数是来自外地乡下的农民。他们的眼中流露出谨慎和惊奇，注视着我这样一个外国人。他们带着许多干粮，可爱的孩子们穿着花布棉袄，不难看出，这些农民来自这个广袤无际的国家的一些偏远地区。雄伟险峻的长城令人惊叹。我站在那里，在我的脚下、我的眼前，伟大的长城蜿蜒起伏在崇山峻岭中，这是一个坚韧不拔捍卫和平的民族象征。“不到长城非好汉”，毛泽东在长征中写下了这一著名的词句，寓意着一种精神，以长城为象征的一种伟大国家的民族精神。在后来的岁月里，当中国向国际旅游者开放之后，我去长城的次数少了，我对她的神秘感逐渐消失。一批批背包游客的涌入，八达岭变成了一个充满了小商贩的旅游商品市场。当然，这是另一种新的开放形式，但是我还是非常怀念最初到长城的日子，我喜欢那些充满了长征精神奋力攀登长城的农民游客。这是我数年前独自登长城时留下的最深印象，这些印象就如同照片，至今还仍然活生生地印在我心里。这种感觉，就如同我游览过的北京其他地方一样，从天坛到颐和园，我所见到的北京人都极大地影响着我人生的理解。让我深为感动的是：他们没有任何排外情绪，他们用善良和纯朴，真心欢迎一个来自

遥远西方的外来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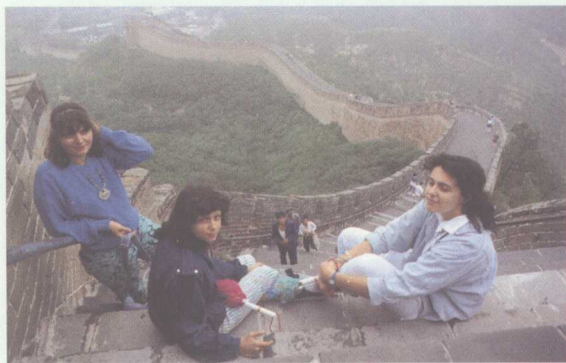
1977年我第二次去中国的时候，从长城返回北京时才发现，我在长城箭楼上丢失了随身携带的两台照相机中的一台相机。为此，范严肃地责怪我的粗心。翌日下午，当我从香山回来，打开房门时，我吃惊地发现前一天在长城已经“丢失”的那台柯尼卡相机就摆放在桌上。相机旁，有一张英文字条，上面写着：“亲爱的朋友，请您保管好自己的财物，万一不慎丢失，请您务必记住丢失在什么地方，这样有人捡到后可以归还给您。您如果不能带着您自己的物品回国，那将多么扫兴呀。”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世上有什么地方能发生这种事？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给我上了一课。后来我向范先生讲述发生的事，顺便问他我的照相机是如何找到的，他们怎么知道是我的相机，如何送还给我的。我的愕然惊奇的表情，使范先生笑得前俯后仰，最后他告诉我，相机是被一个农民捡到的，他把相机交到了八达岭派出所。警察很清楚，这种相机是外国人丢的，后来他们通过机场海关，在我的申报单上查到是我的，最后通过旅行社很快送还给我。我太高兴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去长城的游客蜂拥而至，我的柯尼卡相机再也没进过警察局，我只记得那些通过它的镜头拍下的许多照片。时至今日，这架柯尼卡相机连同莱卡相机一直默默地陪伴我周游列国。

相机失而复得，那时候的风气确是这样。又如，如果我在商店里付完钱，忘记拿找回的零钱就出门，商店的服务员会赶紧追出来，将发票、小

票和零钱交给我，他们绝对不收小费。那时不许收小费，收小费甚至会被认为是不光彩的事。但是中国还能与世界隔绝多久？无论如何，一个如此伟大的和具有如此潜力的国家，怎么可能使它处于封闭状态？毛泽东大胆地试图“创造”乌托邦式的“新”人，他也这样做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了一次相当规模的社会和政治的电休克，现在进行着一次真正的跃进，甚至一次翻跟斗的三级跳的时机已经成熟。所有的前提条件已经存在，私有化和集体的团结互助精神，无论怎样理解，都会产生它们的成果。作为改革家的邓小平重返舞台后，进行了另一种大胆的尝试，即“创建”带有明显儒家思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北京从“新”人的试验中走出来，站在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试验的前列。我是这个号召解放思想和开放边界的历史性过渡的见证人。“又红又专”的口号被“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口号所替代。审判“四人帮”之后，对过去做出的历史评价是：毛泽东是新中国的建筑师，功过三七开：“七分功劳，三分错误”。在经历文化革命的过分甚至狂热之后，中国承认需要再次返回“世界”，邓小平的中国创造了现代化的难以置信的奇迹。通过提出“从现在起到2000年，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和现代化的国家”的口号，开始了可能持续一个世纪的史诗般周期才能完成的第二次大革命。毛泽东曾在20世纪50年代预言：“毫无疑问，下一个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他的预言是对的。

1986年夏天，为了庆祝我到中国10周年，我

决定携全家四人去中国。这次我们是坐西伯利亚快运火车去的，从莫斯科出发穿越欧亚大陆，一个星期后到达中国。我的两个女儿，一个14岁，一个11岁，正处在一个这类旅行最理想的年龄，尽管我的太太提出种种不赞成的理由，但最后还是同意了。我们抵达北京的时间是7月一个天气



马达罗的太太和女儿游览长城

十分闷热的上午，我们像跑马拉松似的到了终点。对于一个从未体验如此经历的人来说，很难想象出这趟旅行的艰辛：9,000公里的铁路线，7天7夜在火车上生活，吃饭，睡觉，等待，观景，所有的时间都在火车上度过。我们横穿过那片辽阔领土，那时还是在苏联统治下的禁区和警察严格监控的地区。在苏联，同俄国共产主义的一些不合情理现象的撞击，对我们来说也有很大的“教育”价值。在莫斯科，我们要去莫斯科的Jaroslavskaja火车站，在俄罗斯的一家名叫Inturist的旅行社预订好出租车，带我们去那里，但是出租车却要把我们送到另一个名叫明斯克的火车站。这会导致我们赶不上每周一趟穿越西伯

利亚的火车,我们的旅行也会因签证过期而取消。幸好此前我已经问过何处才是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站。当我发现司机走错路的时候,我把他的车钥匙拔了下来,冲着他喊“Jaroslavskaja”、“Jaroslavskaja”,他才改变了行车路线。我们到了车站广场,卸下行李后又遇到了困难。那里有两个火车站,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我给搬运工几个卢布作为小费,他凭直觉,匆忙地把我们的行李用他的小推车推到了一个栅栏前。我们又给了警察一些小费,并且对他说:“西伯利亚—北京”,我们才走进了该去的火车站,直奔站台,那辆直达北京的长长的列车已经停靠在那里。在预订的车厢里,两个检票员挡住了我们的路,他们检查完我们的车票后,粗鲁地告知,我们需要分开住宿:妻子和女儿们的卧铺在一个车厢,而我的卧铺则在相邻的另一个车厢。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我预订车票时明明要求预订位于同一包间、铺位号相连的卧铺。是铁路人员自己搞错了?但列车员却说他们没有做出变更的权利。火车马上就要开了,时不我待。我闯入预订好的房间,等待列车长的到来。在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交涉后,列车长终于同意让我们四个人住在一起了。穿越苏联西伯利亚时还算顺利,只是我们用完了当作小费的卢布。我们一直去餐车用餐,吃得很好。但是那些从东欧回国的中国剧团的演员们就没有那么走运了,他们每次要去餐车吃饭都被粗暴地拒绝,真不知道他们这一星期是怎么度过的。列车每次停靠的站台上,除了一些盒装的海产品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买,当地居民还时不时跑上餐车

去买面包。

到了中国,一切都变了:在满洲里车站,到处是欢迎的彩旗,站台商店的货架上商品琳琅满目。北京以她广阔的郊野向我们问候。在北京,东便门周边都是拆迁工地。一眼望去,角楼酷像一艘停泊在一片低矮房屋顶上的帆船,这里将要变成建国门商务区。面对眼前不同文化的冲撞,我的家人惊呆了:北京和我们离威尼斯不远的省城差别是如此之大。我对北京已相当熟悉,但是北京对我的两个女儿来说,一切是那么新奇。不过,反差激起了她们的兴趣。她们很快学会了几句中文,学会了用筷子吃饭,并且将所见所闻写在日记里。对于她们来说,这仅仅是她们“了解中国”之旅的开始。

也就是那年夏天,我认识了陆辛,后来他成为我深入了解中国不可或缺的朋友。当时我有位意大利朋友,他是一个意大利高档餐饮集团的老板,打算在北京开设第一家意大利餐厅,委托我联络此事。后来他决定与北京国际饭店合资经营,当时陆辛代表中方合作伙伴工作,是正在建造的



陆辛和女儿陆佳